
自发秩序与制度秩序： 温州模式研究的理论问题与理论贡献¹

白小虎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了温州模式研究中引用率较高的文献，梳理了制度变迁、产业集群、城市化、民间金融、商会等多角度研究的理论成果，并将“自发秩序”和“制度秩序”的切换作为市场化改革和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共性问题。温州模式的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提供了观察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原发原生的中国样本。自发秩序是温州模式先行启动市场化改革的特殊性一面，对其他区域的改革有启发意义。从自发秩序向制度秩序切换才是市场化改革的一般性和总体方向，温州模式现实的发展困境充分显示了从区域特殊性向制度一般性过渡的现实障碍。温州模式及其研究从正反两方面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道路做出了理论贡献。

【关键词】温州模式 自发秩序 制度变迁 制度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一轮农村工业化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兴起，涌现了温州模式等三大农村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民营企业、专业市场、民间金融等现象一直是温州区域经济的特色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国内外学者三十多年来持续关注的焦点。温州模式研究的论文数量惊人，相当一批论文引用率极高（根据中国知网的文献统计数据）。这些研究一部分是以温州区域经济、农村工业化等为研究对象的整体研究，一部分是民间金融、产业集群、城市、商会等微观领域的研究。温州模式的整体研究与微观研究互为补充和支撑，使得温州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这条主要脉络清晰可见。温州区域经济发展是一长时段、大范围的社会实践，富含学术研究的高品位原料，在这三十多年时间里，到底给了理论研究者什么样的启发，学者们发掘了哪些理论“矿产”并提炼出有价值的成果，温州模式的研究为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了什么独有的贡献？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在回顾相关重要文献的基础上，再次评价温州模式研究的理论贡献。

一、温州模式的整体研究

温州模式的本意是农村工业化的一种区域模式，该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区域发展模式的整体研究是把一个区域的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理论上形成一套解释经济绩效和经济结构变化的逻辑。温州模式早期的研究概括了温州商品经济发展的特色，引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和内涵，这类研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模式研究。温州模式的整体研究从讨论概念内涵和特色概括转向了制度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使得温州模式研究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的理论解释成果，被称之为“温州模式研究重新兴起”，本文就不再一一赘述。^①

制度变迁是对温州经济发展绩效的深层次解释，温州（扩展到浙江）区域经济的成就在经验层面上概括为“民营化”和“市场化”，这两种趋势性力量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②民营化和市场化是市场主体和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的表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产业结构和城乡空间结构的转变，两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制度变迁与经济结构变迁的模式。引入制度变迁理论和最优分析作为底层的分析逻辑，制度变迁的行为与经济发展的绩效通过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相比较单纯对经济绩效的表层现象、结构的特色来概括模式更有说服力和一般性。《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这本专著把 20

¹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课题研究”成果（13ZJQN089YB）。

作者 白小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杭州 311121）

世纪 90 年代以来制度经济变迁理论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水平的思想成果高度集成，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而引起的经济发展绩效变化的解释框架，给温州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一个完整的理论基础，^①而且这一解释框架也具有—般性，同理，中国的其它区域模式可以建立在类似的分析框架上来考察经济发展绩效，还可以根据这一框架的不同程度的差异进行区域模式的比较，例如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就经常进行理论上的对比分析。^②制度变迁理论作为一种参照，便于学者们挖掘温州区域经济发展更深层次的原因。温州的特色，从表层的商品市场、家庭作坊等形式，也随之深入到产权制度，构成了解释温州经济发展的一个解释框架。这些理论在解释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具有一般意义的制度变迁的理论问题，相应的这些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一些理论假设，不仅适用于温州模式，也适用于苏南模式等其他区域发展模式，甚至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一些共性也有参考价值。

制度变迁影响了经济绩效，而制度变迁的方式是更为源头的造成绩效差异和发展模式差异的原因。温州特色在于准需求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的独特方式，这是一种既有创新又有更大范围普适性和复制可能的方式。“温州模式”是随着全国制度环境变化条件下，追求“解放思想”方面摩擦成本最小化（即政治成本最小化）改革方案而推进的以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为主要特征的渐进式改革道路。^③准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在整个国家探索渐进的市场化改革而又缺少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当新旧两种体制发生摩擦，需要最小化改革创新的“政治成本”的一种选择。

市场化改革的温州模式，也有不同的解释逻辑。在过渡经济学的框架中研究温州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变迁，温州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变通”的制度创新方式，有效减少摩擦、降低制度变迁成本。^④从基层发起的市场化改革具有的“自发性”和“扩展性”，体制外的市场化改革是基层的市场主体自发的“秩序”，这种秩序的产生是自发的，有其合理性基础，也是成本小而收益大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扩展也是自发的，只要上层决策者能理解和尊重群众的个体创新，并加以正确的引导，就可能建立起某种秩序，并使这种秩序能不断地扩展。显然，这是一种市场主体“自发性秩序”的制度变迁方式的解释。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较大跨度的主题，也是一个多主体和多结构参与的经济社会活动，在经济的场域之外不可避免还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活动和文化心理背景。从整体来观察的温州模式研究，停留于模型化的制度变迁解释框架显然是不够的，越来越多的研究顺着制度变迁和工业化的特色方式来挖掘其根源，都会回归到温州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如对温州模式加以人文精神角度的透视分析。^⑤这一类文献以社会学家居多，温州本地学者对温州文化和社会心理更有体悟，相关文献也很多。诚然，人文精神、价值理念、社会行为，是比温州经济发展更为基层、影响更为广泛的因素，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解释温州模式的成因以及温州模式独特性所在。但是，文化和社会的因素变化相对于经济社会变化的变化要更加缓慢，更加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绝对不是单向的，温州模式的最新发展以及最新暴露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之道，反而不能求助于文化与社会因素了。另外，文化与社会因素不仅影响区域发展，还包括其它方方面面，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框架并抽象出基本的因素，通过人文精神的深度解读，其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必须把人文精神、社会交往和经济行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例如温州模式中普遍的“人格化交易”是一个经济学概念，^⑥在熟人社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在非熟人社会却会导致高额交易成本。温州模式具有明显的“人格化交易”倾向，温州模式的未来转型较为悲观。

二、温州模式的多侧面微观研究

温州模式的整体研究告一段落，研究对象转向具体的微观市场主体。温州的产业集群、专业市场、民间金融、农民建城、商会行业协会等，从多个侧面展示温州模式的特色，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治理领域，微观主体、市场机制也是多样化的，相关研究也更为深入。

（一） 产业集群的研究

产业集群的研究进入相对较为微观的产业层面，逐步接替了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研究。研究者将“簇群”这一理论概念运用到产业分析中，认为温州的农村工业有很明显的“群落”特点，产业群落能快速扩张。^⑦温州的传统产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遭

遇了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温州鞋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研究指出，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不是产业集群升级的最好路径，产业集群内本地企业之间、当地政府及机构与本地企业之间的互动对本地产业集群的升级也是必不可少的。^⑧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创新活动的研究，认为产业集群也有一定的协作优势并能提升创新能力。集群概念的引入加深了对温州产业的认知，“创新”进入了研究者视野，管理学与经济学交叉的领域里，派生出来的“集群创新”问题是一个亮点。^⑨针对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发生的局部衰落现象，相关研究试图寻找一个同时能解释产业集群兴起和扩散及到最终衰落的统一框架。产业集群所在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传播产业知识和市场信息时起到了很大作用，^⑩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统一为产业分工网络和贸易分工网络，并嵌入本地社会关系网络。温州的产业集群，大部分是本土产业，在集群内部形成分工协作，社会关系网络是协作分工的媒介，缺少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动力。^⑪

（二）特色城市化研究

对温州特色的城市化，研究结论也比较一致：城市化动力来源是专业市场和家庭工厂，结构以中小城市为主，城市普遍缺少基础设施，民间资金的投入对温州城市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特点可以概括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⑫温州特色的城市化典型例子是龙港农民城的研究，^⑬重点讨论一座自下而上自发兴建的城市及其政治经济文化事务自组织管理，龙港的案例充分体现了温州城市化自下而上的资源运作机制。龙港作为一座由具有“农民”身份的工商业者集资兴建的“城市”，当城市建设缺少体制内资源时，第三部门（主要由当地企业家组成的志愿性团体）兴起弥补了政府缺位，使得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成为可能。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需要处理好企业与当地农民的关系、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好龙港和鳌江（隔江临县的中心镇）的关系，第三部门协调这些关系，事关土地使用权出让、资源动员、发展定位和地位等重大事项。同时，文章也指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仍然离不开正式制度，第三部门的作用是有限的，仍将会面临诸多体制上的困难，这将会制约自下而上城市化的进一步成长。

（三）民间金融研究

温州民间金融的底层组织是各种“资金会”，通过对民间金融活动中较为典型的“会”这一形式及其资金借贷行为的微观机制深入研究，认为民间金融“会”的信息机制是资金融通的逻辑，合会的这一信息汇聚机制能降低交易费用，帮助资金需求者从信息匮乏者处借到资金。^⑭在温州民间特殊金融需求、信用关系以及温州地区的文化传统下，资金互助会一类的金融活动效率较高，但风险也较大，通过特殊的信息汇聚机制来解决风险问题，扩展的范围还是有限的。而且，会的资金融通作用其范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也在缩小，真正为业务扩张而通过“会”来民间融资的比例是下降的。^⑮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与台湾有一定的相似性，趋势大致相同，具有自发性，呈现强大生命力，但是台湾合会趋于合法，温州合会转入地下。^⑯对于民间金融的发展趋势，金融制度安排决定了其发展空间。温州民间金融的创新是在中国整体的金融制度扭曲的大背景下展开的，非正式民间尽管金融活跃，但是空间有限，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融资最终还是要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和正规金融服务。^⑰

制度供给事关温州民间金融的前途，这一问题在 2011 年温州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温州民间金融再次成为研究热点，讨论主要是围绕金融改革展开。温州的民间金融改革和制度（公共物品）供给滞后是根源，民间金融问题绕不开改革创新。^⑱民间金融的合约“人格化”明显，要从根本上打破对“三缘”的依赖，更多在法律的框架下展开金融合约，促进民间金融的正规化。^⑲温州民营金融的正式制度供给，政府更多考虑风险最小化和风险最可控，因此选择了政府可控的企业平台来为民间金融服务。^⑳

（四）民间商会研究

温州商会在中国行业组织中发展较快、绩效较好，商会的行业背景与温州的产业密切相关，带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内在激励，被称为“真正的民间商会”。^㉑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一案，是第一次由商会这种民间组织成功地把企业组织起来应对国外的反倾销事件。民间商会能达成集体行动，商会的声誉机制发挥了作用，大企业的内在激励、协会理事会的低组

织成本，以及社会性激励机制是本次集体行动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⑤温州商会的根源与温州的产业集群有密切关系，有其经济利益的内在逻辑和制度基础。温州民间商会是一种合作机制，其生成过程是企业之间合作激励的演进，商会基于这种激励是可以自组织形成并自组织管理。民间商会正是企业为推进集体选择，实现制度化合作，增进整体利益而产生的一种第三方治理机制。^⑥

自主性是温州商会的特色，自主性及其制度空间，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研究的共同视角。民间商会的研究，自主性和制度创新是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温州模式具有积极探索意义的最新进展。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供给是政府和商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于群体自发形成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在商会的治理实践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⑦以自主性和镶嵌性的框架考察商会与政府的关系，自主性（内部的制度化）及其进一步的发展空间都受制于外部制度环境。商会要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找到与地方政府目标的契合点，主动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通过镶嵌的自主性加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依赖，提高自身在地方治理体系中的地位。^⑧商会有助于温州商人跳出“关系型合约”，以“制度性合约”来处理温州商人、企业之间、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不是就算跳出了常见的“人格化交易”了，真的能摆脱“关系型合约”？例如异地商会通过组织的力量，整合本地温州商人的资源，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⑨商会与政府之间是通过非正式的规则还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两者的职能边界与关系，这是个事关温州商会（协会）能否保持合理的方向朝着“治理现代化”前进的重大问题。^⑩

三、温州模式研究的理论贡献

要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并总结其经验与规律，发现其中的理论问题，温州模式是一个理想的观察样本。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经济发展总是走在探索的前列，最先碰到改革实践中的阻力，这些实践给了理论界发现和提出理论问题的机会。温州的发展几乎没有外部要素导入，缺少城市工业基础，没有金融机构的资本，也没有外资引进，工业化、市场化的实践都带有鲜明独有的“温州特色”，是一个近乎于自发原发的经济发展的区域样本，是一个难得的不受外部因素影响的比较单纯的样本。由于其原发性和单纯性，温州模式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观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参照，可以与其它区域发展模式比较，可以在比较的基础上总结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般道路和共性理论问题。

（一）制度与结构变迁的系列理论问题

温州发展的奇迹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引发了理论思考，为什么温州能短时间内大量形成市场主体（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就密布各类商品市场，并把温州的地产商品分销到各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视角，使得温州模式研究在温州的经济绩效和温州特色之间建立起了理论联系，理论问题就转变为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是否能解释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农村工业化的成绩。温州模式的整体研究，通常以制度作为解释经济绩效的因素，以制度变迁来解释温州的市场发育、产业集群、民营企业这些创新事物的出现并何以提升了经济发展。更为一般的是关注了温州何以能率先实现局部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温州的制度变迁有什么特色并且为什么能成功？如自发秩序、^⑪准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多种制度变迁并存等理论假设。不可否认，在整体的区域模式研究中，制度变迁无疑是核心的理论概念和问题，史晋川将其表述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命题。^⑫温州模式的理论参照是经济发展的结构变迁理论，放大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国情，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的主体和方式首先发生变化，资源配置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才有可能改变并带来经济增长。

本文从产业集群、城市化、民间金融和民间商会四个方面汇集了一些研究文献。这些侧面，显然就是结构变迁更为具体的一面。这些热点主题的出现，与温州区域经济表现有关。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产业淘汰、市场衰落、民间借贷频发危机，都不能阻挡理论界对温州的重点关注。显然，温州模式的发展还是引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问题。沿袭资源配置的结构这一理论假设，可以整理出这些研究贯穿的一套理论线索。

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由盛转衰，传统产业如何升级，这是一个资源配置的产业结构是否有效、是否可以升级的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是温州特色的市场交易扩展是否有效的问题，对此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理论假设。如本地社会网络对产业分工网

络、贸易分工网络的锁定，阻碍企业引进人才和创新。^⑨研究产业集群能否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否吸引创新要素，能否持续扩张。

温州的城市化是要素配置的空间结构调整，龙港农民城的研究表明温州模式具有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机制，后续的研究关注温州的城市规模、城市化水平能否提升，温州能否形成大都市区。这些问题的本质是推动要素配置和产业布局的空间结构调整的市场化机制能否扩展，为什么空间结构调整的结果仅仅限于大量自发形成的中小城市。

民间金融研究揭示的温州特色在于自发的金融市场，反映的是社会资金配置的结构，一类问题是从民间融资正面的积极效应提出的，扭曲的金融制度下温州如何形成民间融资的市场结构，是否能形成规范化的民营金融。另一类问题是从民间金融危机负面效应来提出的，民间借贷的信息机制、风险机制、合约机制存在什么样的缺陷，面对民间金融规模扩张与国家层面的金融制度安排之间的矛盾，急需金融改革还是民间金融的自我规范。

民间商会、协会在温州大量涌现并在各行业的治理中起到了很广泛的作用，商会的活动介于市场主体与地方政府之间，是资源配置主体结构的新变化，不仅配置市场资源，而且还配置公共资源。现有的研究分析论证了温州商会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自主自治的组织，也指出了民间商会的发展空间，理论上的问题是这种新型的资源配置结构和第三方组织机制是否是有效的，是否能持续地扩展以及最终的边界在哪里。

纵观以上围绕四个方面的资源配置结构的理论问题，一方面要体现出温州模式具有的配置结构的特色，另一方面也要说明温州模式的配置方式和结构有局限性，四个方面的结构变化都表明市场化配置机制到一定程度就无法持续扩展。

（二）自发扩展秩序与制度秩序的切换

温州特色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结构是多方面的，其共性是自发的市场化。在计划经济的配置方式之外率先从局部领域自发交易、自发市场化配置，逐渐扩展到空间结构、金融结构，从市场资源扩展到公共资源。温州模式的自发市场化以及带来的诸多体制外创新的奇迹，给理论研究者带来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在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条肯定温州模式积极意义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解释思路，这一点在前面的论证中已经充分体现。“自发扩展秩序”思想的影响体现在具体的市场化行为上，如专业市场、产业集群和城市建设，还体现在对“温州模式”整体的解释上。自发秩序与演化的含义比较接近，强调交易秩序扩展演变的过程，突出了自发性的演化动力。一种资源配置结构的形成，背后有自发的动力和演进的秩序。自发的动力侧重于市场主体，而扩展的秩序强调的是交易中竞争与合作的规则。自发扩展秩序使加入这一秩序的市场主体从生意中获益，加入的市场主体增加意味着自发秩序扩展，市场的类型和空间范围也在扩张。自发扩展秩序，很好地解释了温州先发的市场经济快速成长的重要方面。自发扩展秩序为主线的研究，在温州模式的发展绩效表现优异时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当温州模式的某一些方面暴露出问题，甚至爆发一些危机的时候，“自发扩展秩序”的解释力遭到极大挑战。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引发的学术讨论，延伸出对自发的非正规金融的缺陷有更多的认识，呼吁对民间金融加以正规的金融制度引导。民间资金的配置在自发扩展秩序下，“人格化交易”和“关系型合约”的扩张只能局限于有限的孤立区域和传统产业。

与自发扩展秩序同时出现的理论假设是制度变迁，经适当改造为“准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该理论的供给需求框架，把政府和自发的市场主体结合起来，地方政府响应市场主体的自发秩序而提供的正式制度，制度秩序这种公共物品向更大范围、更多主体供给的成本相对节约。纵观温州模式的研究，侧重于温州实践的先发性和创新性时，自发扩展秩序的理论假设就相对盛行，也能给以很好的解释，而且对中国其它区域的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也有启发意义。当温州模式的实践遇到困境，理论研究就反思温州特色的自发扩展秩序的局限性，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的呼声上升，对制度秩序的思考就增多。自发扩展秩序和制度秩序不完全是替代的关系，自发秩序下市场主体探索了资源配置的一种新的结构的可能性，而当自发秩序扩展到一定范围和程度，始终超越不了温州特定的“关系网”，^⑩其产业结构（对应于产业升级）、空间结构（对应于城市化）、国内国外结构（对应于对外开放）、主体结构（对应于民间金融）锁定于温州模式特有的自发秩序。制度秩序是对自发秩序的改造，正式制度供给不仅对

一部分先发的市场主体适用，也对更多的市场主体，甚至是对非温州的市场主体适用，反而有助于市场化配置方式和结构的扩展。温州模式的研究，从提出理论问题的视角而言，自发扩展秩序和制度秩序是两条鲜明的问题主线，经过三十年的理论思考，温州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在这两类秩序的互补与有效切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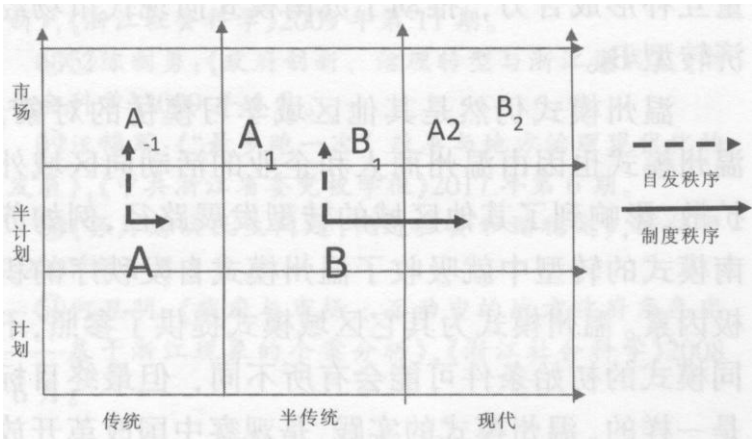
四、秩序切换中的发展模式

一直以来对温州模式从多个角度阐述内涵，例如区域发展模式、制度变迁模式、工业化模式、治理模式。模式本来就可以从多角度去定义，模式也可能是多样化的。为什么出现如此多样化的模式，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在转型中发展，从初始状态到接轨全球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若干种可能的路径和更多可能的转型切换方向。显然，温州模式只是其中的一域的转型路径和切换方向的总和。

温州模式作为一个最早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起步时间较早，很少受到外部模式的影响，是一个初始条件相对有区域特色、转型路径和切换方向比较能独立于外部条件的一种模式。温州模式经常与苏南模式展开理论和实践的对比，^⑨本文依据转型发展的共同点，设置了两模式共同的参照图。如图 1 所示，从计划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与方式维度的变迁。两种农村工业化模式起始都不是完全的计划模式，处于半计划半市场的状态。从传统到现代，是资源配置的结构维度的变迁，受二维平面的限制，只能把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国际国内区域结构、劳动力素质结构等统一成以传统和现代指代的结构。

两种模式起步时的条件有所不同，苏南模式在配置结构上比温州模式更为现代。苏南模式的工业化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近代以来更多受上海的辐射，计划经济体制下苏南农村社队企业就与上海的国营企业、本地的国营企业协作配合，配置结构上已经到了半传统半现代的阶段 B（如图 1）。温州模式起步时处于半计划半市场的传统经济阶段 A（如图 1）。温州模式是一种先发、原生态的转型发展路径，有很多种可能，当然也就更加丰富多彩。自发扩展秩序是温州模式转型发展路径中的大致方向，这是一种市场扩展的力量，影响是多方面的。一种可能是以自发市场的配置方式但是一直停留于传统经济，如状态 A_{-1} ，民间借贷和一些萎缩了的产业集群是例证。温州模式更多是通过自发扩展秩序的力量发展起了半现代化的产业而实现的，温州的古典企业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这是温州模式的企业制度创新的优势。^⑩古典企业学习现有的产业知识，工厂化的制造业产品依托温州人的专业市场和全国性销售网络，能迅速占领市场，如状态 A_1 （如图 1），同一时期，温州的中小城镇兴起，民间资本实力增强。但是，自发扩展秩序的局限性也在逐步增强，专业市场和购销网络没有发生变化，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功能没有形成，企业向外扩张但是很难与国际要素结合，产业外溢严重，引进严重不足。温州人经济发达，异地商会复制了本地温州商会的模式，温州商人在异地投资经商活动中获得当地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其它区域商人无法获得的优势，但是，温州商会也排斥了温州人与更多区外、国外企业的合作，阻碍了温州企业家与地方政府形成正常的契约化、制度化政商关系。

图 1 秩序切换中的发展模式



民间自发扩展秩序动力强大，制约了地方政府的作为。在争取制度化的优势与特殊化的政策优势这两者之间，显然温州商人通过商会组织更能争取到更大的优势。温州商人的能量大大超过了温州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被商会等组织替代，“准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丧失供求基础。自发扩展秩序是一种市场成长的秩序，但是在温州却是“特殊主义”的秩序，在局部分割的市场和规模经济不够明显的产业里，特定对象之间交易的自发秩序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区域更广且规模经济明显、交易更为标准化的领域，自发扩展秩序劣势明显，特殊主义的自发秩序的交易成本更高，而一视同仁的制度秩序的交易成本更低。反观苏南模式(B)，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发秩序与制度秩序这两种力量。苏南模式的半计划状态，并不是按照计划来配置资源，而是因为苏南的社区官员同时又是企业家，既提供物品，又指导着企业的经营，连接了乡镇企业与中心城市国有企业的配套协作，模仿了国有企业的现代产业组织，招商引资连接了国外的技术资源，直接从半传统半现代转向现代结构 B₁。苏南模式的长处是制度秩序，对市场主体没有地域的偏向，更加容易学习温州模式中“自发扩展秩序”的优势。苏南模式通过两次民营化的改革，完成了市场主体的再造，同时吸纳了跨国企业，市场主体的结构更加多元丰富。结构的现代化和主体的民营化两种力量互补形成合力，推动了苏南模式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 B₂。

温州模式仍然是其他区域学习模仿的对象，温州模式也因由温州商人和企业的活动向区域外扩散，影响到了其他区域的转型发展路径，例如苏南模式的转型中就吸收了温州模式自发秩序的积极因素。温州模式为其它区域模式提供了参照，不同模式的初始条件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最终目标是一样的。温州模式的实践，是观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式市场化的窗口。温州模式研究在基于区域特色的转型发展路径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发展模式，为其他区域模式的转型发展找到了一条有普遍共性的路径和转型的规律。温州模式有特殊性的一面，因为温州模式的先发性和探索性，难免带有地方一域的文化社会根基的影响，但是这种特殊性并没有改变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根本方向。温州模式也具有一般性的一面，温州模式的研究充分说明了自发扩展秩序的力量和政府提供正式制度的力量，在转型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发挥的不同作用，这是温州模式研究在理论上的一般意义。而且，不管是哪种区域模式，一旦自发扩展秩序切换为制度秩序，达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目标，区域模式的特殊性也将消失。尤其是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当今时代，一个地区的发展，更应该与国际接轨，与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市场接轨，而不是过于强调区域特色。参与特色化区域竞争的只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而企业则要面向全国竞争和全球化竞争。

注释：

- ① 史晋川、朱康对：《温州模式研究：回顾与展望》，《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 ②③ 史晋川：《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 ③ 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④⑤ 洪银兴、陈宝敏：《“苏南模式”的新发展——兼与“温州模式”比较》，《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7期。
- ⑤ 金祥荣、朱希伟：《“温州模式”变迁与创新——兼对若干转型理论假说的检验》，《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8期。
- ⑥ 徐明华：《温州模式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兼论过渡经济学相关的几个问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3期。
- ⑦ 朱康对：《小农家文化与温州农村家庭经济》，《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 ⑧ ③④ 史晋川：《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
- ⑨⑫朱康对：《经济转型期的产业群落演进——温州区域经济发展初探》，《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3期。
- ⑩朱允卫、董美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温州鞋业集群升级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6年第10期。
- ⑪魏江、申军：《传统产业创新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模式——以温州低压电器业集群为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3年第1期。
- ⑬白小虎：《产业分工网络与专业市场演化——以温州苍南再生晴纶市场为例》，《浙江学刊》2010年第6期。
- ⑭朱磊、诸葛燕：《温州城市化机制研究》，《经济地理》2002年第1期。
- ⑮朱康对：《来自底层·的革命——从龙港农民城看温州模式城市化中的市民社会成长》，《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
- ⑯陈德付、戴志敏：《标会的投融资效率研究——来自温州市苍南县的一个案例分析》，《财经研究》2005年第9期。
- ⑰张翔：《合会的信息汇聚机制——来自温州和台州等地区的初步证据》，《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 ⑱胡军、陈建林：《台湾和温州民间金融组织发展历程的比较分析——以合会为视角》，《南方金融》2008年第8期。
- ⑲史晋川、叶敏：《制度扭曲环境中的金融安排：温州案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1期。
- ⑳张仁寿：《民间借贷与制度性公共品供给》，《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
- ㉑史晋川：《人格化交易与民间金融风险》，《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
- ㉒向静林、张翔：《创新型公共物品生产与组织形式选择——以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为例》，《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
- ㉓㉔王诗宗、何子英：《地方治理中的自主与镶嵌——从温州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
- ㉕黄少卿、余晖：《民间商会的集体行动机制——对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的案例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4期。
- ㉖马斌、徐越倩：《社区性产业集群与合作性激励的生成——对温州民间商会生发机制的社会经济学考察》，《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7期。
- ㉗陈剩勇、马斌：《温州民间商会：一个制度分析学的视角》，《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 ㉘陈剩勇、马斌：《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温州异地商会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 ㉙杨光飞：《从“关系合约”到“制度化合作”：民间商会内部合作机制的演进路径——以温州商会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8期。

③⑩冯兴元：《市场化——地方模式的演进道路》，《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1期。

③⑪谢健：《区域经济国际化：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比较》，《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10期。

③⑫朱华晟、王缉慈、李鹏飞、李伟：《基于多重动力机制的集群企业迁移及区域影响——以温州灯具企业迁移中山古镇为例》，《地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28卷3期。

③⑬金祥荣：《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温州模式”及浙江改革经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